

族际交往中的“石榴籽效应”^{*}

——个体特征、网络结构与社会效应

郭小弦 李晓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族际交往途径,在理论上分析了族际交往意愿的决定因素、梯度差异、行为结果和社会效应,并采用中国西部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族际交往的决定因素来看,跨民族交往能力和现代性水平深刻影响着族际交往意愿;第二,从族际交往的行为结果来看,族际交往意愿直接形塑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存量;第三,从族际交往的社会效应来看,族际交往显著影响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和国家认同程度。这些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包括未来民族政策中需要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和民族语言推广,加速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进程,在民族地区优化社会资本、提升社会信任和增强国家认同,以在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交往 社会资本 信任 国家认同

作者郭小弦,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基地研究员;李晓光,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基地研究员。地址:西安市,邮编 710049。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①从社会学视角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如何通过加强各民族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增强社会网络和提升社会资本,最终提升各民族成员的社会信任和国家认同的过程。那么,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新时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将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索如何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优化交往结构、增加社会资本、提升社会信任和增强国家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社会网络视角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021-GMG-03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居民的主观生活感受研究”(项目编号:17XJC840002)、陕西省博士后基金项目“陕西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项目编号:2017BSHEDZZ1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一、研究起点：西部地区的族际交往

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8.89%,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增长了0.4个百分点,^①这充分体现出在党的带领下各民族全面发展进步的繁荣样貌。从绝对数量来看,少数民族人口大约为12,547万人,这一数量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规模,成为中国当前和未来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现实来看,我国超过75%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西部地区,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圈,例如藏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北方草原文化圈等;^②同时,西部少数民族中超过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发展目标。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也是西部地区难以取得突破性发展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例如,无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还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都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存在明显差距和短板。面向未来,西部地区依然面临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艰巨任务,承担着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③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本文聚焦我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

西部地区的族际交往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五十六个民族及其祖先共同生活在华夏这片土壤之上,并且通过不断地互相交往、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作为民族交融的根本动力,族际交往始终贯穿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脉络之中,不仅嵌入在“和亲册封”等政府持续推进的民族交融政策之中,更体现于“四海一家”等群众智慧和社会实践之中。这种跨民族交往,不仅是各个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资源流动的基本渠道,更成为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根本动力。

纵观近十年民族学领域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两个议题: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④首先,在理论建构方面,已有研究致力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概念辨析、内涵界定和理论建构。例如,民族交往是社会交往的特殊形式;^⑤民族交流则进一步拓展到经济、文化、社会、心理、情感等层面,而民族交融则强调民族交往交流的自然跃进形式,体现为民族同质性增强、异质性减少的历史过程;^⑥也有学者将“三交”的本质归纳为“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结构交融”。^⑦学者们普遍强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建构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框架,而必须基于中国社会情境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和创新。其次,在实践路径方面,学者们主要聚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印证、个案阐释和路径设计。例如,就实践印证和个案阐释而言,研究者致力于挖掘和总结“三交”对民族团结的现实意义,并通过实地调研

①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

② 马忠才、赫剑梅:《族际职业地位分层及其决定因素——西部地区回族与汉族的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2期。

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公报》2020年第15号。

④ 张萍、齐传杰:《十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徐姗姗、王军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脉络与前沿演进——基于CNKI论文(2011~2020)的知识图谱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

⑤ 李静:《民族交往心理构成要素的心理学分析》,《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

⑥ 张萍、齐传杰:《十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

⑦ 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来阐释“三交”对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长远影响。^①就路径设计而言,学者们强调从互嵌社区、相近地区、文化扶贫强化现实社会中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②

社会学领域对于族际交往的研究可以归纳为现状研究和后果研究两个研究脉络。第一个脉络主要聚焦民族交往的基本现状,包括交往场域、交往层次和影响因素等。对于交往场域的研究发现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主要发生在学校、社区和工作场域;^③交往层次的研究将民族交往分为不同交往层次,包括以聊天、一起工作为代表的浅度交往,以做邻居和亲密朋友为代表的中度交往,和以通婚为代表的深度交往。^④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空间流动和心理特征等因素会对族际交往产生显著影响。^⑤第二个研究脉络主要聚焦民族交往的社会后果。学者们主要关注跨越民族的社会交往,如何通过工具性效应提升人们的劳动力市场回报,以及如何通过情感性效应形塑人们的主观福祉。有研究发现,跨民族交往不仅会提升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而且会拉近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和促进民族交融。^⑥

梳理以往研究,笔者发现,现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民族交往研究的理论脉络,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首先,学界关于民族交往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现实关照相对较弱。应加强力度。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各个少数民族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字,这些特征可能会深刻影响民族成员的社会交往能力;各个民族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这同现代性观念之间存在纷繁复杂的辩证关系,这也可能成为制约族际交往的重要因素。其次,在族际交往的社会效应方面,以往研究缺乏对宏观社会整合内容的实证分析,比如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基本主线,加强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程度是其必然要求。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采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的方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政策精神进行解读。然而,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中的深度推进,理论研究同实证研究之间的有效衔接愈发迫切和必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聚焦西部地区的民族交往,分析其决定因素和社会效应,并基于西部相关代表性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分析:族际交往的“石榴籽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① 徐姗姗、王军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脉络与前沿演进——基于 CNKI 论文(2011~2020)的知识图谱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21 年第 4 期;李永祥、曹津永:《从当代云南“山坝结构”民族分布的新变化看民族互嵌交融——基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三个案例》,《民族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② 张萍、齐传杰:《十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20 年第 5 期。

^③ 刘庸:《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区民族关系比较研究——以甘青宁三省区的四个社区为例》,《青海社会科学》2013 年第 2 期;王庚:《校园科层下大学生交往模式的跨族群比较》,《青年研究》2018 年第 1 期;李晓光:《跨族群交往的力量——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族群交融》,《社会发展研究》2020 年第 2 期。

^④ M. Gangl, “Scar Effects of Unemployment: An Assessment of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1, No. 6, 2006;雷鸣、李晓光:《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和族际交往》,《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1 年第 3 期。

^⑤ 李静、刘继杰:《影响新疆族际交往的心理因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雷鸣、李晓光:《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和族际交往》,《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1 年第 3 期;马戎:《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9 年第 6 期。

^⑥ 李晓光:《跨族群交往的力量——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族群交融》,《社会发展研究》2020 年第 2 期;李黎明、李晓光:《族群、社会资本与收入差距——对西北族群和西部汉族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

展,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沿用了“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比喻,用“石榴籽效应”概括民族团结,特别是族际交往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的作用、产生的效应。本文的“石榴籽效应”,在研究中具体指通过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充分发挥人际交往的社会效应,最终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更加全面地理解族际交往及其“石榴籽效应”,我们建构了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图中方框和圆框均代表抽象的理论概念,箭头表示各个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中间圆框代表族际交往,是本文分析的核心概念,我们区分了族际交往意愿和族际交往行动,并将检验交往意愿对行动的影响;关于交往意愿,我们依据人际交往的亲疏远近区分了三个层次: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三个层次;关于交往行动,我们也区分了三个层次:建立友谊、聊天交谈和共度节日。左侧方框是区域特征和个体特征,这是影响族际交往意愿的差异来源;我们依据西部社会的现实特征,不仅聚焦区域特征(包括地区旅游业发展、现代化水平和民族多样性)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也会检验个体特征(包括跨民族交往能力和个体现代性水平等)对族际交往的影响过程。右侧的两个方框是族际交往的后果,包括网络结构和社会效应两个部分。三个箭头是本研究要检验的三个理论命题,即:①族际交往的影响机制命题,②族际交往的网络结构命题,③族际交往的社会效应命题。

图1 理论框架:族际交往的“石榴籽效应”

(一)族际交往的影响机制命题

本文的第一个理论分析是族际交往的影响机制命题。民族交往的本质仍是社会交往,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交往意愿和交往行为存在差异性。综合考虑西部少数民族的特征后,我们选取区域特征和个体特征来研究族际交往的影响机制。

区域特征与族际交往。作为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部地区,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现代化水平和民族构成等宏观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这会成为影响族际交往的结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会议的讲话和中多次提出要“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做到各民族同步走,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①那么,如何从区域特征出发,加强各个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文聚焦区域层次的旅游业发展、现代化水平和民族多样性。首先,民族地区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可能会提升族际交往。作为文化传播、文明交流、增进友谊的桥梁,旅游活动可以有效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②因此,在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大力发展蕴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动力。其次,民族地区

①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② 张英、于沛鑫,《西部地区旅游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也可能增强族际交往。现代化水平较低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在西部地区,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在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因此,提高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是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路径。最后,西部各区域的民族多样性,也可能形塑族际交往。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西部及边疆地区,并呈现出“小聚居大杂居”的特征。^① 尽管小聚居的特征可能会制约族际交往,但散居、杂居的分布特征却蕴含着族际交往的力量,如果特定区域的民族构成的多样性越高,则潜在的族际交往机会越多。

个体特征与族际交往。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部地区,各个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农村地区,个体的现代性水平相对较低,这些差异成为制约族际交往的个体特征因素。那么,如何通过改善个体特征来促进族际交往? 本文重点聚焦个体层面的现代性水平和跨民族交往能力。首先,个体的现代性水平可能会影响族际交往。理论上讲,区域的现代化水平投射在微观层面,就是个体的现代性水平。与传统性相对应,现代性中体现的开放包容、图新求变等精神都可能促使个体突破交往边界,开拓包括民族特征在内的异质性交往,成为跨民族交往的重要动力之一。基于此我们推断,那些现代性水平相对较高的少数民族成员,更有可能保持相对较高的族际交往。其次,个体的跨民族交往能力深刻影响着族际交往意愿和行动。个体层面的社会交往能力是决定族际交往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既成就了民族特色文化,但也可能成为制约民族之间社会交往的障碍。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少数民族群体不仅有自己的饮食文化、风俗习惯,部分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并且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圈,例如藏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北方草原文化圈等。在此背景下,以听、说、读、写为代表的语言交流能力,既可能是影响跨民族交往的壁垒,也是跨民族交往能力的重要体现。那些掌握相对较强的通用语言或其他民族语言的个体,往往具备更强的跨民族交往能力,因此更有可能表现出较高的族际交往意愿。

(二) 族际交往的网络特征命题

本文的第二个理论命题是族际交往的网络特征差异。第一个命题检验的是跨民族交往的意愿,第二个命题则是检验交往意愿如何影响了实际的交往特征,即网络结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内心深处的交往意愿,深刻形塑着个体的实际社会交往行为。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不同层次的族际交往意愿,会产生怎样的行为结果和交往模式? 换言之,交往意愿的多样性是否会造成他们真实的社交网络结构具有不同的特征?

沿袭社会网络的理论脉络,本文将从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等具体指标来分析族际交往对网络特征产生的实际影响。网络规模反映人际交往的范围,族际交往意愿的提升可能加强个体与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互动机会和交往频率,由此提升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反映个体社会交往的达高性程度(通常指网络成员中的最高社会经济地位);族际交往意愿的提升,可以拓宽不同民族和阶层之间的接触机会,从而提高网络成员的达高性程度。网络差异反映个体社会交往的异质性程度,即网络成员之间的差异性程度;族际交往意愿的提升可以增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接触机会,从而加强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程度。总体而言,族际交往意愿提升对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的影响,最终会带来社会资本质的飞跃。此外,这几个指标体

^① 《中国民族》,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test/2005-07/26/content_17366_3.htm。

现社交网络中蕴藏的资源,因此这一命题也反映了族际交往在资源获取方面的效用,即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将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流动。^①

(三)族际交往的社会效应命题

本文的第三个理论命题是族际交往的社会效应。这是最能够直观体现民族交往现实意义的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时期民族工作方略中处于关键位置,它的社会效应,特别是在人们的主观感受层面的社会效应是其重要意义的良好体现。基于人际互动的社会交往具有工具性效应和情感性效应,^②社会交往对心理健康、幸福体验、社会融合等多维度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已经得到大量支持。^③作为人际交往的形式之一,族际交往是否具有同样的社会效应?我们的理论判断是肯定的。理论分析和现实观察都告诉我们,跨民族交往可以扩展社会认同、遏制群体冲突、促进族际交融。^④我们将重点从主观维度分析民族交往的社会效应,具体包括社会信任和国家认同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社会信任是个体层面社会态度的经典测量。在社会信任研究中,政府信任和一般信任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两种信任维度,前者反映个体对正式机构或组织的制度信任,后者反映个体对一般社会大众的非制度性信任。在西部民族地区,政府信任和一般信任显得尤为重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族成员对政府绩效的认可程度和对社会环境的态度评价。那么,族际交往意愿会提高社会信任吗?我们认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有助于加强民族成员对政府绩效的了解和认可,尤其是促进民族平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提升政府信任。同时,族际交往有助于加强各个民族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文化传播和观念分享,从而增强各个民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认同和社会共情,最终提升一般信任水平。

国家认同则是公民国家意识的体现,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个文明之间的差异依旧重塑着世界秩序,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化的观念正在面临一些地区保守主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加强人们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世界不同国家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作为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部地区,加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是未来民族工作的重要目标。那么,族际交往能否加强国家认同?本文认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有助于促进民族文化传播和缩短心理距离,从而加强族际交融。这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将最终提升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和忠诚程度,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变迁调查”(CSSC2010,以下简称

① 李晓光:《跨族群交往的力量——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族群交融》,《社会发展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N. Lin, Y. Bian,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7, No. 3, 1991.

③ Y. Bian, L. Zhang, J. Yang, X. Guo, M. Lei,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People: A Multifaceted View,"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121, No. 1, 2015; L. Song, N. Lin,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Taiwa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 50, No. 2, 2009; 郭小弦、王建:《社会支持还是参照群体? 社会网络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④ X. Briggs de S.,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 Interracial Friendships, Class, and Segregation in America," *City & Community*, Vol. 6, No. 4, 2007.

“西部调查”)。该调查由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召集主持,在西部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西藏、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进行代表性抽样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PPS),在每个省份从市、行政区、街道、社区四个层次抽取样本,保证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该调查对象为 18 岁以上的城乡居民,共收集有效样本 10,946 个。^①西部调查以社会网络为核心议题之一,对社会交往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同时,该调查设置了民族模块作为西部社会的特色测量。这套数据是西部地区进行民族研究,特别是族际交往研究的绝佳数据资料。在排除了社会交往以及民族相关问题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为 9772 个。

(二)变量设计

族际交往意愿。族际交往是本研究的核心变量。根据博格达思社会心理距离量表的经典测量,^②问卷中依次询问了被访者与其他民族的人“聊天”“一起工作”“做邻居”“做亲密朋友”及“本人或子女与其他民族通婚”的意愿程度,各题目的选项为从“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的五分类测量。事实上,族际交往的形式从最基础的聊天、共事,到有选择的交友、睦邻,再到最深层次的通婚、组建家庭,由远及近、由浅入深,呈现交往层次与程度的梯度差异。我们将与其他民族的人聊天、一起工作加总得到民族交流变量,与其他民族的人做邻居、做亲密朋友加总得到民族交往变量,而最深层次的通婚则成为民族交融变量。表 1 的描述性统计显示,民族交流、民族交往、民族交融的均值逐步降低,这是梯度差异的一个体现。同时,我们将各项得分加总,得到“族际交往总分”,作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模型。该得分越高,民族交往的意愿越强。

族际交往行动。为了评估跨民族的交往行动,本文选取了以下测量指标。一是建立友谊,我们使用的测量题目为“您是否有其他民族的朋友?”,被访者如果选择“是”,则意味着发生了跨民族建立友谊的交往行动。二是聊天交谈,我们使用的测量题目是“您过去一年中是否经常与其他民族的人交谈”,被访者如果选择“是”,则意味着发生过跨民族聊天交谈的交往行动。三是共度节日,测量题目是“您是否过当地其他民族的节日”,被访者如果选择“是”,则代表被访者发生过跨民族共度节日的交往行动。

网络结构。即社会交往结构,我们使用重要节日网来进行测量。在个体社会网络的测量中,春节拜年网已经是公认的经典测量题器之一,^③它根据“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的理论内涵,使用春节作为事件载体,记录人们在春节期间互相拜年的社交行为,并以此来测量其社会网络。尽管春节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普适性,但西部大量少数民族在春节之外,还有自己重要的民族节日,如“古尔邦节”“肉孜节”“藏历新年”“火把节”等。针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我们将春节也调整为各民族自己“最重要的节日”,这是对经典春节拜年网的延伸和拓宽,符合我国西部民族、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事实。这些重要节日是社交活动的频发时段,提供了节日拜会的重要契机。基于重要节日网的测量,我们计算了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顶端三个具体的网络结构指标。其中,网络规模指重要节日时的拜会人数;网络差异是节日拜会的职业类别个数,作为敏感性分析,我们界定了网络极差,即网

^① 根据调查时的各级人口规模,在每个省份的市、区、街道三级抽样后,最终抽取 60 个社区,每个社区 20 个家庭(少数大规模社区被抽中 2 次,完成 40 份问卷),共计 1200 个家庭。新疆、西藏因客观原因,完成 600 个家庭的调查样本。

^② Bogardus E S., "Measuring Social Distan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Vol. 9, 1925.

^③ 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 年第 2 辑。

络成员中最高社会地位和最低社会地位之间的职业声望之差；网络顶端是节日拜会时地位最高的职业声望得分。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我们通过对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出了“社会资本”变量，分值越高，则社会交往的网络中蕴含的资源越多。

跨民族交往能力。我们用一组题器测量跨民族交往的能力，具体包括“能听懂其他民族的语言”“能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对话”“能书写其他民族的文字”三道题目，均为五点测量，将选项得分相加，得到跨民族交往能力的综合得分。该得分越高，跨民族交往的能力越强。

个体现代性水平。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现代人特征的描述均聚焦在个体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并与具有市场化、理性化等特征的现代社会对公民的要求在本质上是契合的。综合英克尔斯(A. Inkeles)以来的中外关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及其核心特征的研究，^①我们在调查中设计了公共参与、开放包容、个体效能、理性精神、图新求变五个维度，每个维度下设四个具体测量题器，用以测量个体的现代性水平。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每个维度对应一个现代化指标，得分越高，现代性越强。

社会信任。本研究中的社会信任包括一般信任和政府信任两个维度，一般信任测量的是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政府信任测量的是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二者均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四分类的测量。政府信任的均值为2.87，略高于一般信任(2.5)。

国家认同。在西部调查的数据中，没有直接测量国家认同的题器，我们选择了问卷中关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题目作为代理变量。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为了国家，我愿意牺牲个人利益”的态度，被访者在“很不同意、不同意、说不清、同意、很同意”中进行选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中做出的选择实际上反映了个人国家认同的程度。该变量最大值为5，最小值为1，样本均值为3.79。

区域特征变量。为了评估区域层次特征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三个区域层次的变量。一是地区旅游业发展状况，这是考虑到许多民族地区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实现民族文化传播和交流，实际测量是来自2010年各地区的游客接待数量(单位是万人)。二是地区现代化水平，我们使用的指标是西部各省份的社会现代化指数。三是各地区的民族构成的多样性水平，我们基于调查数据中各个地区的各个民族的分布情况，计算出各地区的民族构成的异质性指数，作为地区民族多样化水平的测量指标。

控制变量。作为民族研究议题，我们首先在研究中控制了民族类型。西部调查中有丰富的关于民族信息的测量，参考马戎的民族样本分类方法，并结合西部调查中各民族的实际分布，我们将样本划分为8类，即：汉族、壮族、回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土家族和其他民族，这一划分方式在以往研究中也得到过多次应用。^②西部调查的数据中，汉族占总样本的71.97%，壮族2.5%，回族4.37%，维吾尔族2.78%，藏族8.93%，蒙古族1.15%，土家族2.15%，

^① A. Inkeles, DH, Smith,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青年研究》1985年第4期; 闵学勤:《城市人的理性化与现代化——一项关于城市人行为与观念变迁的实证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李东山:《人的现代化测量探索》,《天府新论》2004年第5期; 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② 李晓光:《跨族群交往的力量——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族群交融》,《社会发展研究》2020年第2期; 马戎:《现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类型划分》,《社会》2008年第1期。

其他民族共 6.15%。除民族类型外,我们还控制了其他人口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项、户籍、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工作部门。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N=9772)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u>族际交往意愿变量</u>				<u>人口学特征</u>			
民族交往	9772	3.66	0.79	年龄	9772	42.60	13.23
民族交流	9772	3.73	0.72	教育年限	9772	7.95	4.58
民族交融	9772	3.31	0.86	男性	9772	50.52%	/
族际交往意愿	9772	14.67	2.85	民族			
<u>族际交往行动变量</u>				汉族	7033	71.97%	/
建立友谊	9772	44.98%	/	壮族	244	2.50%	/
聊天交谈	9772	47.53%	/	回族	427	4.37%	/
共度节日	9772	16.06%	/	维吾尔族	272	2.78%	/
<u>交往能力变量</u>				藏族	873	8.93%	/
跨民族语言能力	9772	4.36	4.34	蒙古族	112	1.15%	/
<u>现代性变量</u>				土家族	210	2.15%	/
公共参与	9772	13.37	2.33	其他民族	601	6.15%	/
开放包容	9772	12.60	2.18	党员	9772	13.64%	/
个体效能	9772	12.62	1.91	工作部门			
理性精神	9772	12.72	2.05	党政机关	665	6.81%	/
图新求变	9772	13.87	1.94	国有企业	468	4.79%	/
<u>社会网络变量</u>				私有企业	478	4.89%	/
网络规模	9772	34.30	38.53	个体经营	1434	14.67%	/
网络差异	9772	3.79	2.74	农业部门	3546	36.29%	/
网络顶端	9772	53.65	31.40	缺失值	3181	32.55%	/
社会资本	9772	29.97	21.12	城市地区	9772	46.16%	/
<u>社会效应变量</u>				<u>区域特征</u>			/
国家认同	9762	3.79	0.75	地区旅游业发展	9772	67.64	60.43
政府信任	8887	2.87	0.84	地区现代化水平	9772	0.53	0.21
一般信任	8496	2.50	0.68	地区民族多样化	9772	0.31	0.30

(三)统计模型

本研究主要采用一般线性回归和二分类逻辑回归。一般线性回归主要用于族际交往意愿、网络结构和社会效应为因变量的模型。以族际交往意愿为例,统计模型表达为如下形式:

$$Y = \mu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sum_{p=3}^P \beta_p X_p + \epsilon \quad (1)$$

在公式(1)中,Y代表族际交往意愿,代表区域层次变量构成的一组向量,代表个体特征变量构成的一组向量,代表控制变量构成的一组向量。通过该公式,我们可以评估区域层次和个体层次特征对族际交往意愿的影响。

二分类逻辑回归用于族际交往行动为因变量的模型,因为族际交往行动是二分类变量,具体统计模型为表达为如下形式:

$$\log\left(\frac{p_i}{1-p_i}\right) = \mu + \beta_1 X_1 + \sum_{p=2}^P \beta_p X_p \quad (2)$$

在公式(2)中,等式左边代表的是族际交往行动的发生概率,代表的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意愿,代表控制变量构成的一组向量。通过二分类逻辑回归,我们可以评估族际交往意愿对交往行动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结果

本部分将从图1的理论框架出发,对相应的理论命题依次展开实证分析。首先,本文将聚焦民族交往梯度及其决定因素,并分别从区域特征和个体特征来考察。其次,我们将分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的行为结果,尤其是对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后,本文将聚焦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的社会效应,尤其是对社会信任和国家认同的形塑过程。

(一)族际交往的影响机制分析

谁更愿意与他族交往?为了分析民族交往的梯度差异及其决定因素,本文建立4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表2)。模型1到模型3的因变量依次为民族交流、民族交往和民族交融,是三个具有梯度差异的民族交往测量指标,其中民族交融代表最高交往程度。模型4因变量为族际交往意愿,是民族交往、民族交流和民族交融三个变量的数学加总。^①

表2 民族交往梯度理论命题的实证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民族交往	民族交流	民族交融	族际交往意愿
<u>区域层次变量</u>				
地区旅游业发展	0.001*** (0.000)	0.001*** (0.000)	0.004*** (0.000)	0.005*** (0.001)
地区现代化水平	1.195*** (0.323)	0.289 (0.298)	2.477*** (0.330)	3.391** (1.167)

^① 作为敏感性分析,本文尝试使用因子分析将三个变量进行降维处理,由此提取出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变量,发现研究结论是稳定的。

地区民族多样化	0.179***	0.201***	0.067	0.764***
	(0.034)	(0.031)	(0.035)	(0.122)
<u>个体层次变量</u>				
跨民族交流能力	0.016***	0.017***	0.019***	0.068***
	(0.002)	(0.002)	(0.002)	(0.009)
个体现代性水平				
公共参与	0.012**	0.015***	0.013***	0.057***
	(0.004)	(0.003)	(0.004)	(0.013)
开放包容	0.026***	0.022***	0.033***	0.096***
	(0.004)	(0.003)	(0.004)	(0.013)
个体效能	0.016***	0.016***	0.014**	0.064***
	(0.004)	(0.004)	(0.004)	(0.015)
理性精神	-0.005	0.005	-0.004	0.002
	(0.004)	(0.004)	(0.004)	(0.014)
图新求变	0.008*	0.008*	0.005	0.032*
	(0.004)	(0.004)	(0.004)	(0.016)
民族(汉族=0)				
壮族	-0.037	-0.049	0.082	-0.165
	(0.043)	(0.039)	(0.044)	(0.154)
回族	0.001	0.128**	-0.369***	0.238
	(0.052)	(0.048)	(0.053)	(0.189)
维吾尔族	-0.041	-0.063	-0.649***	-0.184
	(0.042)	(0.038)	(0.042)	(0.150)
藏族	-0.152	-0.223**	-0.104	-0.770*
	(0.090)	(0.083)	(0.092)	(0.326)
蒙古族	0.103	0.046	0.084	0.320
	(0.081)	(0.075)	(0.083)	(0.292)
土家族	0.416***	0.289***	0.717***	1.527***
	(0.059)	(0.054)	(0.060)	(0.213)
其他民族	0.122***	0.093**	0.221***	0.450***

	(0.035)	(0.033)	(0.036)	(0.128)
男性	0.043**	0.082***	0.115***	0.298***
	(0.016)	(0.015)	(0.017)	(0.059)
年龄	-0.005	-0.004	-0.006	-0.014
	(0.004)	(0.003)	(0.004)	(0.014)
年龄平方	0.059	0.030	0.071	0.128
	(0.043)	(0.040)	(0.044)	(0.155)
教育年限	0.008***	0.010***	0.009***	0.040***
	(0.002)	(0.002)	(0.002)	(0.009)
党员	0.070**	0.037	0.070**	0.234**
	(0.024)	(0.022)	(0.024)	(0.086)
工作部门(农业部门=0)				
党政机关	-0.001	0.017	0.002	0.019
	(0.035)	(0.032)	(0.036)	(0.127)
国有企业	-0.021	0.003	-0.095*	-0.069
	(0.041)	(0.038)	(0.042)	(0.148)
私有企业	-0.006	0.028	0.035	0.073
	(0.039)	(0.036)	(0.040)	(0.141)
个体经营	0.035	0.024	0.013	0.113
	(0.026)	(0.024)	(0.027)	(0.094)
缺失值	0.027	0.030	-0.033	0.088
	(0.022)	(0.021)	(0.023)	(0.081)
城市	0.083***	0.047**	0.052*	0.208**
	(0.020)	(0.018)	(0.020)	(0.072)
截距项	2.459***	2.693***	1.647***	9.870***
	(0.152)	(0.140)	(0.155)	(0.549)
样本量	9,772	9,772	9,772	9,772
拟合优度	0.088	0.106	0.183	0.113

注:双尾检验显著度,*** $p < 0.001$,** $p < 0.01$,* $p < 0.05$;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教育年限、政治身份、工作部门和城乡变量。

首先,我们聚焦区域层次变量。读表可知:第一,地区旅游业发展程度越高,则民族交流、

民族交往和民族交融的意愿显著越高,总体族际交往意愿也显著更高。这就意味着,大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可以显著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最终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第二,地区层次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可以显著提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西部很多民族地区有各自独特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且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扩张的现代经济理性共存,^①而本文的发现意味着,民族地区的现代性水平越高,则各民族成员越有可能会突破民族传统文化的边界,而与其他民族成员产生交往交流交融。第三,地区层次的民族多样性越高,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显著越高。这意味着,提高各个地区的民族构成的多样性程度,可以有效促进不同民族成员相互接触的机会,最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其次,我们聚焦个体层次变量。第一,个体的跨民族交往能力显著影响族际交往意愿。本文通过跨民族语言交流能力来测量民族交往能力,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具有独特语言文字,这成为民族交往过程的一个制约因素。如果某一民族成员能够突破本民族语言文化边界,掌握其他民族的语言技能,则可能会显著促进该成员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表2结果证实了这一推论,即跨民族交流能力越高,个体的民族交流、民族交往、民族交融意愿都显著更高;族际交往意愿也呈现出相似规律,即跨民族交流能力每增长1个测量单位,族际交往意愿会显著上升0.107个单位。由此可见,加强各个民族之间的语言和文化交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及规范化进程,将有力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个体的现代性水平也会影响族际交往。本研究纳入现代性测量的五个维度去预测民族交往,分别包括公共参与、开放包容、个体效能、理性精神和图新求变。表2实证分析结果提供了充分依据。读表可知:个体的公共参与得分越高,则会显著增加其民族交往、民族交流和民族交融的意愿,并且也会显著提升民族交往的总体得分。开放包容、个体效能和图新求变也呈现出相似规律,即个体在这三个现代性指标的得分越高,也会显著提升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意愿。理性精神似乎与族际交往意愿并无明确关联,它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都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这就意味着,族际交往本身可能并非经过理性计算或考量产生的结果,它与个体的理性化程度无关,更有可能是情感先发、人文关怀、观念包容等感性因素驱动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公共参与、开放包容、个体效能和图新求变等现代性维度深刻形塑着个体的族际交往意愿,这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不断加快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提升人们的现代性水平,将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动力。

再次,控制变量也显示出重要信息。第一,男性的族际交往意愿高于女性,为此,未来民族政策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女性(尤其少数民族女性)在劳动参与和社会交往,提升整体族际交往意愿。第二,党员高于非党员,表明党员在现实生活中的确能够发挥带头作用,民族工作中也需要进一步培养党员干部的作用,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第三,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族际交往意愿;同时,城市地区居民的族际交往意愿显著高于农村地区。这进一步印证了前文有关现代性假设的推断,即作为现代性水平相对较高的高教育群体,和作为现代化发展更快的城市地区,都是推动各个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力量。这也为未来民族政策提供了一定依据,即持续推进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快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现代化进程,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① 雷鸣、李晓光:《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和族际交往》,《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二) 族际交往的意愿行动转化分析

族际交往意愿如何影响族际交往行动?从意愿到行动的转化是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关注的议题。理论上讲,没有付诸行动的意愿是无法形成社会关系网络,也难以对国家认同和社会信任产生实质性影响。为了检验族际交往意愿到族际交往行动的转化过程,我们选取了三种族际交往行动来展开分析,包括建立友谊、聊天交谈和共度节日。

表3 族际交往意愿影响民族交往行动的实证分析结果(二分类逻辑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建立友谊	聊天交谈	共度节日
族际交往意愿	0.259***	0.204***	0.215***
	(0.013)	(0.012)	(0.017)
教育年限	0.064***	0.027***	0.035***
	(0.009)	(0.008)	(0.011)
城市	0.502***	0.399***	0.111
	(0.070)	(0.068)	(0.093)
截距项	-4.635***	-4.025***	-6.523***
	(0.369)	(0.346)	(0.485)
样本量	9,772	9,772	9,772
拟合优度	0.197	0.155	0.147

注:双尾检验显著度,*** $p < 0.001$,** $p < 0.01$,* $p < 0.05$;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教育年限、政治身份、工作部门和城乡变量。

表3为实证分析结果,其中使用的模型为二分类逻辑回归。首先,族际交往意愿的上升,可以显著提升建立族际友谊的几率。表3模型1结果显示,族际交往意愿每提升一个测量单位,个体与其他民族成员建立友谊关系的几率会上升30%(计算方法为 $1 - e^{-0.259}$)。其次,族际交往意愿的上升,可以显著增加各民族成员聊天交谈的几率。模型2结果显示,族际交往意愿每提升一个测量单位,则族际聊天交谈行动的几率就会上升23%(计算方法为 $1 - e^{-0.204}$)。最后,族际交往意愿的上升,可以显著增加各民族成员之间共度节日的几率。模型3结果显示,族际交往意愿每上升一个测量单位,则各民族成员共度节日的几率会上升24%(计算方法为 $1 - e^{-0.215}$)。由此可见,各个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意愿的提升,可以有效增加现实生活中各民族成员的交往行动,交往意愿蕴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

(三) 族际交往的网络特征命题检验

在西部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是否影响人们的真实交往结构,从而增加人们的社会资本?作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提升途径就是增强人际交往的差异性。近些年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个体与不同性别、阶层、种族、职业等群体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增强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由此提升社会资本含量。那么,这一规律在西部民族地区

是否成立? 为了验证这一命题,我们首先将在回归分析中将社会网络结构特征作为因变量,随后将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表 4 为实证分析结果。

表 4 社会资本理论命题的实证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网络规模	网络顶端	网络异质	网络极差	社会资本
族际交往意愿	0.628***	0.469***	0.020*	0.466***	0.316***
	(0.129)	(0.099)	(0.009)	(0.103)	(0.067)
民族(汉族=0)					
壮族	2.842	3.818**	0.300*	5.298***	2.766**
	(1.857)	(1.423)	(0.128)	(1.484)	(0.967)
回族	3.405	1.116	-0.022	0.785	0.751
	(2.331)	(1.786)	(0.161)	(1.862)	(1.214)
维吾尔族	7.168***	-2.294	-0.658***	-1.879	-2.240*
	(1.789)	(1.370)	(0.124)	(1.429)	(0.931)
藏族	28.646***	3.813	-0.055	3.093	5.014**
	(3.445)	(2.639)	(0.238)	(2.753)	(1.794)
蒙古族	16.051***	6.549*	0.249	7.127*	5.297**
	(3.739)	(2.864)	(0.258)	(2.987)	(1.947)
土家族	-2.619	-0.438	-0.287	-0.363	-1.595
	(2.696)	(2.065)	(0.186)	(2.154)	(1.404)
其他民族	4.813***	-2.476*	-0.248*	-2.102	-1.070
	(1.460)	(1.118)	(0.101)	(1.166)	(0.760)
男性	6.556***	0.016	0.214***	0.955	1.730***
	(0.766)	(0.587)	(0.053)	(0.612)	(0.399)
年龄	0.321	-0.427**	-0.072***	-0.382**	-0.366***
	(0.177)	(0.135)	(0.012)	(0.141)	(0.092)
年龄平方	-5.956**	3.146*	0.460**	1.376	1.931
	(2.025)	(1.551)	(0.140)	(1.618)	(1.054)
教育年限	1.089***	1.954***	0.159***	1.656***	1.386***
	(0.111)	(0.085)	(0.008)	(0.088)	(0.058)

党员	3.677**	2.781**	0.343***	3.018***	2.710***
	(1.118)	(0.856)	(0.077)	(0.893)	(0.582)
工作部门(农业部门=0)					
党政机关	9.261***	10.548***	0.865***	9.386***	7.981***
	(1.662)	(1.273)	(0.115)	(1.328)	(0.865)
国有企业	4.077*	9.399***	0.874***	6.714***	6.920***
	(1.932)	(1.480)	(0.133)	(1.544)	(1.006)
私有企业	7.166***	8.996***	0.992***	9.080***	7.669***
	(1.847)	(1.415)	(0.128)	(1.476)	(0.962)
个体经营	3.646**	10.166***	0.947***	10.139***	7.385***
	(1.230)	(0.942)	(0.085)	(0.983)	(0.640)
缺失值	3.559***	6.496***	0.394***	5.074***	4.089***
	(1.060)	(0.812)	(0.073)	(0.847)	(0.552)
城市	-5.177***	8.925***	0.448***	3.809***	3.865***
	(0.930)	(0.712)	(0.064)	(0.743)	(0.484)
截距项	8.000	33.285***	3.670***	28.570***	19.276***
	(4.334)	(3.320)	(0.299)	(3.463)	(2.257)
样本量	9,772	9,772	9,772	9,772	9,772
拟合优度	0.064	0.228	0.218	0.161	0.242

注:双尾检验显著度,*** $p < 0.001$,** $p < 0.01$,* $p < 0.05$ 。

首先,族际交往意愿的提升能够显著优化社会网络结构。表4显示,族际交往意愿每上升1个测量单位,网络规模会显著增加0.628个单位。可见,族际交往意愿能够显著增加个体的网络成员数量。其现实含义是,如果各个民族成员能够从心理上突破民族文化边界的制约,超越本民族范围的内部交往,则能够显著增加个体的社会交往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族际交往意愿不仅可以增加交往规模,而且可以优化网络结构,尤其增加网络成员的异质性,并提升网络成员的达高性。具体而言,表4显示,族际交往意愿每上升1个测量单位,则网络顶端会显著提高0.469个单位,网络异质会显著上升0.02个单位,网络极差会增加0.466个单位。由此可见,族际交往意愿的的确可以显著优化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

其次,族际交往意愿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社会资本。表4显示,族际交往意愿每上升1个测量单位,社会资本会上升0.316个单位。这就意味着,个体如果能够在心理上突破传统文化边界的约束,与其他民族成员保持广泛的社会交往,则有助于提升整体的社会资本。这种通过跨民族交往产生的社会资本增量,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回报等,而且有

助于拉近各个民族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和促进民族交融。^① 对此,未来民族政策有必要通过推进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资本和促进民族交融。

最后,各个民族在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方面存在异质性。以汉族作为参照群组,壮族在网络差异和网络顶端方面存在明显优势,这种优势最终体现在社会资本的存量方面。维吾尔族尽管在网络规模方面处于相对优势,但是在网络差异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这最终制约了其社会资本的建构和累积。藏族在网络规模方面存在绝对优势,但并未带来网络差异和网络顶端的优势;尽管社会资本也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但是这种相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网络规模的绝对优势所驱动的,而不是网络差异、网络顶端等体现社会网络资源含量的指标而驱动的。蒙古族的网络规模更大,并且网络顶端也显著更高,最终有效提升了其社会资本存量。对此,未来民族政策有必要结合各个少数民族的社会网络特征,有针对性地推动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由此优化各个民族的社会网络结构和提升社会资本存量。^②

(四)族际交往的社会效应命题检验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会产生何种回报?为了检验这一命题,本文选取社会信任和国家认同来检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效应。社会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民族交往对个体层面社会态度产生的影响。国家认同能够反映出民族交往对国家层面价值观念的形塑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详见表5。

表5 社会效应理论命题的实证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一般信任	政府信任	国家认同
族际交往意愿	0.013*** (0.002)	0.023*** (0.003)	0.020*** (0.003)
男性	0.051*** (0.015)	-0.031 (0.018)	0.038* (0.016)
年龄	0.014*** (0.003)	0.010* (0.004)	0.015*** (0.004)
年龄平方	-0.072 (0.040)	-0.031 (0.046)	-0.108** (0.042)
教育年限	0.009*** (0.002)	-0.006* (0.003)	-0.006** (0.002)

① 李晓光:《跨族群交往的力量——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族群交融》,《社会发展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表3控制变量也显示出重要信息。整体而言,男性的社会资本显著高于女性;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资本存量越高;党员社会资本显著高于非党员;相对于农业部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个体经营工作部门的个体其社会资本显著更高;城市地区居民的社会资本显著高于农村地区。

党员	0.119***	0.170***	0.132***
	(0.022)	(0.025)	(0.023)
工作部门(农业部门=0)			
党政机关	0.004	-0.054	0.077*
	(0.032)	(0.038)	(0.034)
国有企业	0.002	-0.142**	-0.011
	(0.037)	(0.044)	(0.040)
私有企业	0.007	-0.209***	-0.126***
	(0.036)	(0.043)	(0.038)
个体经营	-0.019	-0.096***	-0.037
	(0.024)	(0.028)	(0.025)
缺失值	-0.052*	-0.064**	0.012
	(0.021)	(0.024)	(0.022)
城市	-0.084***	-0.166***	-0.094***
	(0.018)	(0.021)	(0.019)
截距项	1.846***	2.236***	3.084***
	(0.085)	(0.100)	(0.089)
样本量	8,496	8,887	9,762
拟合优度	0.046	0.125	0.051

注:双尾检验显著度,*** $p < 0.001$,** $p < 0.01$,* $p < 0.05$;模型中控制了民族的虚拟变量。

首先,我们聚焦族际交往意愿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分别将一般信任和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纳入模型。表5显示,族际交往意愿每增长1个测量单位,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会上升0.013个单位(模型1),可见,族际交往的确能够显著提升人们对社会大众的社会信任水平。与此同时,族际交往还可以显著提升政府信任水平,表5结果表明,族际交往意愿每增长1个单位,政府信任水平会增长0.023个单位(模型2)。由此可见,各个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的确可以显著提升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无论是对社会大众的信任水平,还是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各个民族在一般信任和政府信任方面存在异质性。表5结果显示,回族和蒙古族对社会大众的一般信任水平与汉族无异,同时比汉族更加信任政府机构。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信任模型比较相似,尽管两个民族对社会大众的信任水平低于汉族,但对政府机构的信

信任水平显著更高。土家族对社会大众的一般信任水平高于汉族,但是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与汉族无异。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群体普遍对政府机构具有很高的信任水平,尤其是回族、维吾尔族、藏族和蒙古族的政府信任水平显著高于汉族,这是对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方面作出的努力的最好认可。

其次,我们聚焦族际交往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为了捕捉个体对国家的认同程度,我们借助个体在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博弈过程,评估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表5结果表明,族际交往意愿每增长1个测量单位,国家认同会显著增加0.02个单位(模型3)。由此可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确能够显著促进个体对国家的忠诚程度和认同程度,愿意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对此,未来民族政策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程度,从而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控制变量也显示出重要信息。第一,男性的一般信任水平和国家认同程度都高于女性;年龄越大,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和国家认同水平相应增长;党员在一般信任、政府信任和国家认同程度方面都显著高于非党员。第二,教育年限的增长会提升人们的一般信任水平,但是对政府信任和国家认同程度有下降趋势。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个体的政府信任和国家认同。第三,相比于农业部门,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个体经营工作部门的个体在政府信任水平方面更低,私有部门的个体在国家认同方面也显著更低。最后,相比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在社会信任和国家认同程度方面显著更低,这也是未来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五、结论与讨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当前和未来民族政策的主线。新近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重点论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路径,围绕族际交往在民族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取得丰硕成果,^①但是有关族际交往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在理论方面探索族际交往意愿的决定因素、梯度差异、行为结果和社会效应,同时使用西部地区的代表性样本数据开展实证分析。我们以“石榴籽效应”概括族际交往在促进民族团结、提升社会信任、增强国家认同等方面的效应,从而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三个。第一,从族际交往的影响因素来看,区域层次的旅游业发展、现代化水平和民族多样性有助于提升族际交往意愿;个体的跨民族交往能力和现代性水平会深刻影响族际交往意愿。作为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部地区,各个民族有其特定的语言习俗,一方面要尊重和保护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应避免语言文字壁垒成为制约民族交往的掣肘。在此背景下,那些具备跨民族语言听说读写能力的民族成员,通常具有较强的民族交往能力,往往会成为民族地区的弄潮儿,推动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现代性水平也深刻形塑着个体的族际交往意愿。尽管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民族特色的重要成

^① 徐姗姗、王军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脉络与前沿演进——基于CNKI论文(2011~2020)的知识图谱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李永祥、曹津永:《从当代云南“山坝结构”民族分布的新变化看民族互嵌交融——基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三个案例》,《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

份,但也会制约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那些现代性水平更高的民族成员,往往能够突破本民族文化边界的约束,与其他民族成员保持紧密的互动交流。

第二,从族际交往的行为结果来看,族际交往意愿会深刻形塑着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存量。当个体从心理上突破民族文化边界的制约,与其他民族成员保持较高的族际交往意愿时,就会带来社会资本的增量。这种增量来源于社会网络结构的变化,具体而言,族际交往意愿的增长,不仅能够提升社会网络规模,而且会提高网络差异和网络顶端,这种网络结构的优化最终会提高社会网络资源含量和社会资本存量。

第三,从族际交往的社会效应来看,族际交往意愿会显著影响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和国家认同程度。作为族际交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信任能够反映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个体层面社会态度的影响,而国家认同能反映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国家层面忠诚程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族际交往意愿的提升会显著提高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这种提升效应不仅体现在个体对社会大众的一般信任水平,也体现在个体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族际交往意愿的上升也会显著增加个体的国家认同程度,具体表现为个体更加愿意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些族际交往产生的社会效应具有丰富的理论启示,政府信任和国家认同能够反映出个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因此从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思路出发,对于当前和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供有关部门做决策参考。第一,未来民族工作中应同时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普及和民族语言文字的推广。作为影响族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跨民族语言交流能力的培养是未来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一方面,民族政策需要增强语言共性,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增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另一方面,民族政策需要尊重语言差异,保留各民族的语言特色,但有必要将民族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特色在各民族之间、各国家之间进行传播推广,尤其借助音乐、电影等媒介形式,从而增加各民族之间的理解、包容和交融。

第二,未来民族工作中应重视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提升。作为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部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成员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因此整体的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这是当前和未来民族工作中一个不容小觑的事实。未来民族工作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高各民族成员的现代性水平,由此增强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第三,未来民族工作中应重视优化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作为信息流通和影响传播的重要渠道,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深刻形塑着人们的社会经济行动。然而在西部民族地区,尽管部分少数民族成员因民族聚居而保持较高的社会网络规模,但是这些社会网络成员之间具有高度同质性,最终导致民族成员的社会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从而限制个体社会经济行动。未来民族政策可以通过加强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少数民族成员的空间流动(尤其是农村地区到城镇地区),从而优化社会网络结构和增强社会资本存量,推动社会资源在各民族之间的流动。

第四,未来民族工作中应重视提升社会信任和国家认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开展实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不仅体现在民族地区教育、经济、人口、文化等诸多客观指标上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也体现在少数民族成员对政府机构的积极评价和认可。面向未来,民族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各个民族成员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尤其提升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责任编辑 马俊毅〕